

● 吕元明 著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学论释

——兼及中日比较文学

林林题



日本文学论释

——兼及中日比较文学

吕元明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新登字 12 号

日本文学论释

——兼及中日比较文学

吕元明 著

责任编辑：吴长安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傅德毓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14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98 千 印数：0 001—1 000 册

ISBN 7-5602-0672-7/I·39 (精) 定价：12.00 元

目 录

第一编 总 论

- 中日文学交流异同的比较 3
日本近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 8

第二编 古代论

- 中日翻译史上的《魏志·倭人传》 17
古代日本汉字汉文发端简议 32
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与中国先秦思想家的影响 41
《古事记》的变体汉文与修辞 54
《万叶集》与中国古典文辞 60
《怀风藻》与中国六朝、唐初诗 80
“访采真茎”的空海 88
《入唐求法巡礼记》里的唐朝社会 99

日本古代兼容思想评述

——以中日政治、思想交流为主题 102

雅乐、谣曲与秦汉题材 124

第三编 中世近世论

《太平记》的武家与儒家 129

武家与《贞观政要》、《群书治要》 132

孙子兵法的影响力 135

五山文学的中国观 138

《水浒》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147

《水浒》和日本的《八犬传》 163

山片蟠桃——日本近代文明的曙光 191

第四编 近代论

日本近代文学的确立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论 199

明治文明的批判者

——评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212

重压的苦恼

——评夏目漱石的《门》 218

芥川龙之介论 228

第五编 现代论

- 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两级发展 241
- 评日本七十年代文学 248
- 河上肇的著作在中国 264
- 小林多喜二与中国作家 269
- 异评《活着的士兵》 273
- 无畏的人——中岛健藏 280
- 野间宏及其长篇《真空地带》 286
- 《沙拉纪念日》中译本序 290
- 短歌的特有韵味
- 兼评倭万智的短歌及八尾昌里的中译 293

第六编 中国论

- 日本的鲁迅研究史 305
- 回忆鲁迅的珍贵记录
- 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 349
- 新发现的鲁迅致井上红梅赌博解说图 357
- 日本战前对郭沫若的研究 362
- 日本战后对郭沫若的研究概貌 379
- 郭沫若的初期诗歌与日本和歌、俳谐及新体诗 400
- 锤炼出来的友谊
- 郭沫若与日本友人 411

“望将冥福裕后昆”

——郭沫若和日本出版界友人田中庆太郎、岩波茂雄 419

吴伯萧谈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423

我观台湾的日本文学翻译 425

文学是社会的镜子

——读黄玉燕译《日本名家小说选》 430

访和田美术馆 435

后记 440

第一编

总论

中日文学交流异同的比较

从出土文物和古文献来看，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

在公元前 300~200 年间，时当日本弥生时代，水稻栽培、铁器等已传入日本。日本也出现了制作漆器的漆部连。虽然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日本的这种进化是和大陆相联系的，却无人表示异议。

公元以后，日本史料逐渐丰富。公元 57 年，后汉光武帝授“汉委奴国王”金印（后汉书）。公元 107 年，倭国王遣帅升出使后汉，向安帝献上“生口”160 人。此后出现了《魏志·倭人传》记载的邪马台国，加强了同中国的联系。公元 239 年卑弥呼遣使难升米见魏王，卑弥呼被授“亲魏倭王”金印紫绶。以后六十年间，倭王八次向中国派出使臣。归化人在日本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元 413 年，倭王讚遣使东晋，献方物。

公元 587 年，主张改革的豪族苏我马子灭物部守屋。592 年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大力推行吸收大陆文明的政策。593 年在难波兴建佛教四天王寺，595 年圣德太子师事高句丽僧人慧慈。596 年兴建法兴寺（飞鸟寺）。602 年百济僧人观勒献上历本天文地理书。603 年制定冠位十二阶。翌年完成宪法十七条。607 年遣小野妹子使隋。第二年妹子归朝时，隋使裴世清同行。妹子

再次奉命使隋，并派出留学生与学问僧。从 607 到 614 年的七年间，推古朝派出三批遣隋使。

公元 618 年，中国隋灭唐兴。630 年，舒明天皇二年，派犬上御田锹为遣唐使。从推古始，舒明、皇极、大化、白雉、齐明、天智、弘文、天武等数代天皇的几十年间，是日本古代国家的伟大转折点。645 年苏我氏灭亡，日本加快了变革的速度。第二年发布大化改新之诏。672 年在壬申之乱中，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战胜大友皇子（弘文天皇），确立起天皇专制的一统国家。

在建立日本古代专制国家中，前后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对于促进日本国家制度、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遣唐使成员可查者，以第九次、第十次人数最多，九次一行 557 人，十次一行 594 人。日本全面学习中国，形成巅峰。

在近代以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是一边倒的。中国的经济、文化高于日本，后进者向先进者学习、吸收。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日本的典籍、制度、教育、文字、词汇、工业、农业、建筑、美术、历法、数学、服饰、风俗、习惯等，无不受中国的影响。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是全面的，也是彻底的。这对古代处于落后的日本，具有重大意义。使处于后进阶段的日本，迅速赶上了先进国家。

在近代以后，中日的文化交流却发生了逆转的变化。1868 年，日本实行了明治维新的变革，由封建主义制度过渡为资本主义制度。以大化改新和遣唐使的劲头，向西欧开放，广泛地吸收西欧的制度、经济与文化的经验。在不到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成为可以与资本主义列强相抗衡的国家，在经济、文化上也居于亚洲各

国的前列。

可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对象。中国不仅继续为落后、愚昧的封建主义所统治，同时又沦为半殖民地的状态。历史上对日本居于绝对影响地位的中国，迅速为日本所超过。日本的工业化蒸蒸日上，钢铁、煤炭、发电、交通、通信、纺织等远远将中国抛在后边。中国开始受到以前曾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的日本的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的折磨。日本教育、文化的发展，也令人刮目相看。

社会制度的优劣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表现出来。文化的优劣也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表现出来。中国的觉醒分子开始东渡日本，学习日本的改革、经济、科学技术及教育、文化等。

正如水向低处流的事实，高阶段的经济、文化，影响后进者。落后的中国不管当权者的意愿如何，只能成为日本的学习者。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中国对日本的学习与引进，却没有达到古代日本学习中国的程度。

第一，近代影响于东方的，不仅有近代化的日本，也还有资本主义与文化相当发达的英、美、法、德、俄、意等国，而后者却更主要。古代影响于日本的，却主要是中国。

第二，古代、中世纪时期，中国尽管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国，但和日本却是和平相处的。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日本走上资本主义以后，却是靠军事侵略发展起来的。中日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友好的、和平共处的，而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关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日关系，中国对日本的开放与学习只能是有限度的。大部分留日生，在日本侵华时期都是反对日本国家的，就是绝好的证明。

第三，在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以后，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苦经历中，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国不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日本的很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对中国也失掉了诱惑力。

第四，历史条件已不再是古代那种一边倒的关系，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上均有相当的历史积累与发展，进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时代。

两千余年来中日的文化交流，对任何一方都是大有利益的。日本古代对中国的开放、学习，促使愚昧国家一跃而走向文明世界的行列。近代中国如果不是同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鲁迅、郭沫若的成长，都将是不能实现的。

交流必然导致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冲击，也必然引起守旧者的反抗。日本七世纪的大化改新，曾连续发生对抗性的武装冲突。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几乎使他们人头落地，却没有取得大化改新那样的成功。前者把日本几乎翻了一个个，使日本走向开化。后者却是保守派取得胜利，中国照旧落后。

交流在促使进步的前提下，是根据一个民族、国家的需要吸收的。在这里不存在全盘中国化，也不存在全盘日本化的问题。日本古代学习中国是非常彻底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为发展日本民族国家服务的。政治制度、法制、度量衡、历法、科学、技术、汉字、汉文、美术等等，洪水般地泻进日本列岛。然而日本实行的是班田制却不是井田制，是天皇制却不是中国的朝代更替，是日本民族的文字语言而不是中国语言分支。然而，凡是日本需要的却又全面吸收。如至今使用汉字，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日

本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什么。

文化交流虽说如江河之水流，非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但国家、政权的政策，却能起到促进或促退的作用。日本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都是起了促进的作用，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起了促进作用的。日本江户幕府的锁国令、中国清末的闭关自守，却是起了大倒退的作用。

中国七十年代后期始的改革和开放，迅速地揭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最生动的一页。

交流的促进，要靠国家、政权的开放，也要依靠先进的觉醒者的奋斗。对中国，对日本，这是有历史经验的。

日本近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

一切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财富，也会成为充实世界各民族精神的或借鉴的力量。日本民族引为骄傲的夏目漱石、森鸥外、岛崎藤村、有岛武郎、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小林多喜二、井上靖等人，在中国被广泛翻译，广为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1918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举轰动了沉睡的中国文坛，敲响了反帝反封建的钟声。鲁迅后来说，他在日本留学时，因为“幻灯事件”，弃医转向文学，想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他还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鲁迅的话，大致勾勒出他的走上创作道路，是有赖于世界范围的优秀文学的，学习了它的精神和创作经验，而最终目的是为了“改良”中国社会。而且，鲁迅是把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列为他“最爱看的”一类作家中，显示了他是怎样吸收了日本近代文学中

的精华。

谈到他开始创作道路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时，鲁迅说这篇小说的写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我认为这里也包括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等人的小说。

在鲁迅之后，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建立的创造社，对于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创造社萌芽于日本，并在日本建立。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里写道：“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洲回来的慧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两派的影响。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了。”

郭沫若的话是有道理的。创造社的主要支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是日本留学生，主要成员的冯乃超、李初梨、郑伯奇等也是日本留学生。

翻开郭沫若的最初的创作集《女神》，就会发现他的摆脱中国旧诗体束缚而生出革命呼声的现代诗，和日本明治维新后新起的诗人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铁干、石川啄木、北原白秋等人的破除日本旧体诗的束缚的现代体诗、口语诗，是有联系的。他是受了这些破除旧格律诗的影响的。他的诗歌使用的感叹词“哟”，是中国现代诗歌中具有极大感情色彩的呼词。其实这个词很可能是从日本的“よ”引发出来的。

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并不是只限于诗歌、小说方面，在戏剧上，田汉也是受了日本的影响的。他的留学日本，是受了德

富芦花的小说《不如归》的感动。在中国戏剧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夏衍，也是起步于日本的。

鲁迅和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他们的受教育和日本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走上文坛和日本文学也是分不开的。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了积极的、有益的作用。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与成长，具有巨大的意义。

但是，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并不只是文学形式的问题，事实上在思想上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

五四运动当时，参加这一革命运动的大部分作家，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没有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觉悟，他们基本上是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高度参加了这一伟大运动的，鲁迅是当时反帝反封建最坚决最不妥协的斗士，但他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的，他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最早的一部是1919年刊载于《国民公报》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武者小路是主张理想主义的“白桦派”的成员。1921—1923年间，鲁迅主要是翻译了森鸥外、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夏目漱石、有岛武郎等人的作品。这些翻译显示了鲁迅的选择标准。他是选择那些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具有斗争精神的作品。

为日本颇为熟知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致力于日本文学翻译甚勤。1923年和鲁迅出版了《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后又出版了《两条血痕》《狂言番》《陀螺》等。他也写诗，写小品文。他在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这个口号在当时是具有进步倾向的。

其后作为“新军”突起的郭沫若，五四运动时期在思想上是